

又一位可爱的老头儿走了

■陈四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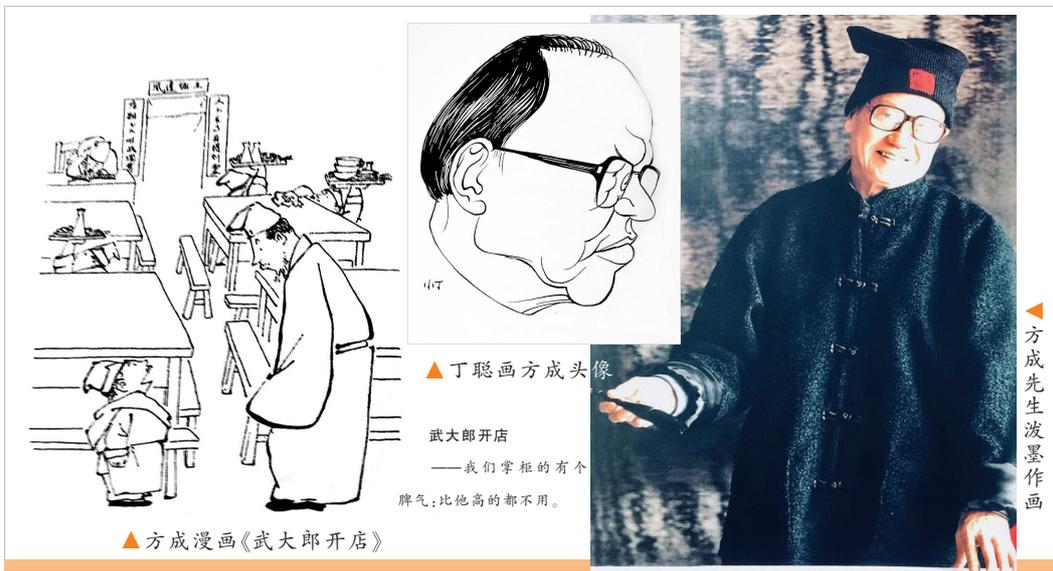
方成先生去世了。不久前刚走完 100 岁的人生历程，满指望他再创建一个高峰，没料想他竟急于到老朋友们那里团聚了。在那里，丁聪、沈峻、苗子、郁风、舒展、牧惠、詹同……一大群朋友在等着他。

丁聪的《我画你写——文化人肖像集》中，有一段方成的自我介绍：“方成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原籍广东，诞生在北京，说一口北京话。自谓姓方，但其父其子都是姓孙的。非学画者，而以画为业，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学会。终身从事政治讽刺画，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。”

妙文一段，令人解颐。原来，他本姓孙，名顺潮，广东中山人，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。但朋友们不管熟悉还是陌生，都管他叫“方先生”。他的本姓名本，极少人知。就是知道，也仍称“方先生”。这也是人以才称——他的才华见识都在方成漫画里搁着呢。

朋友戴敦邦评说他：“多才多艺，平易近人，青春不老，幽默补膏。”到底有多“补”？照他老朋友侯宝林的说法：笑一笑，十年少。不知有多少七八十岁的人被他逗得大笑七次——回到了童年。但他不笑。所以，他寿数常在——一直活了整整一个世纪。不信，你看丁聪画他的肖像：眉关紧锁，一脸的忧愁幽思。或许，正因为满腹忧愁，所以希望用笑来驱赶，在笑声中同那些忧愁说声“拜拜”！屈大夫“忧愁幽思，乃赋离骚”。方成先生是：忧愁幽思，乃作漫画。

上世纪 50 年代初，我在北京读中学，对报纸上的新闻、评论并不太关心——因为不懂，但对漫画却兴致勃勃。那时，号召学苏联，什么都学。苏联漫画界有一个“库克雷尼克塞”，是库勃里亚诺夫、克雷洛夫和索科洛夫三位漫画家共用的笔名。不久，人民日报也有了“方成、钟灵”。除了华君



▲丁聪画方成头像

武大郎开店
——我们掌柜的有个
脾气：比他高的都不用。

▲方成漫画《武大郎开店》

方成先生波墨作画

武、米谷、丁聪，他们两位应算我最早记得的漫画家了。

我问方先生：您学的是化学，听说，当时已被几家大公司（好像是侯德榜的公司）聘请，待遇很好，怎么就丢了专业，改行漫画了？他说，我不想学，就想画漫画。问他漫画是哪儿学的，答曰：在武汉大学当学生时，画壁报练出来的。就这样，他几经辗转，到了北京，居然进了《人民日报》，成了中华第一报的专职漫画家，开始了职业的漫画生涯。

我同方先生相识，已是“新时期”了。那时我正同丁聪先生合作，在《读书》杂志发表文画相生的《新百喻》，后来又开了“诗话画”专栏。因为《新百喻》是用浅近文言写作，被几位老先生误认为是哪里冒出来的“出土文物”。于是，因为丁先生的引见，每每得以参加前辈先生的聚会，因而得以常见方成先生。

方先生耳背，聚会中，听的时候多，常常微笑着看着大家，不大插话，大约就是所谓“聾人多笑”吧。但若有插话，常语出惊人，引得哄堂开怀。他引人发笑的话，每每是一本正经地说出，自己从来不会笑，甚至还以严肃的语气说出。哄堂大笑之际，他仍旧蹙眉不语，好像还有疑问：你们笑什么？有什么可笑吗？

那时，他已七八十岁，聚会往返，还是常常骑着自行车。餐后回家，也不拒“打包”。他们那一代老人家，才气之高，令人难望项背，而平易亲和，又如邻家大爷。

方先生一幅为人历久难忘的漫画是《武大郎开店》——一家餐馆，掌柜人矮，伙计一个个更矮——画上题辞是：“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：比他高的都不用。”直到今天，过了几十年，一提方成，许多人还是忍俊不禁地想到他笔下的“武大郎”：文学艺术的典型，

历久弥新。

方先生在众多漫画家中，可以说是最富理论兴趣的。他研究“笑”，研究“幽默”，不仅从理论上研究，还研究创造幽默的大师。我在大学读书时，蒋孔阳先生讲授西方美学，讲到柏格森时只有短短一个课时。课后我问蒋先生：对柏格森的《笑之研究》怎么看？蒋先生说：没有看到书，不好讲。其实，我之所以问，只是因为我刚从旧书店淘到一册柏格森的《笑之研究》，是张闻天早年翻译的。蒋先生听后马上说，你给我看看，或许可以多讲一课。

那时，中国关于“笑”“幽默”的专门著作鲜见。从事“笑”之艺术表演的人不少，研究“笑”之产生的书少见。或许有鉴于此，方成先生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，便孜孜不倦于幽默的研究，出版了《幽默·讽刺·漫画》《滑稽与幽默》《侯宝林的幽默》《方成谈幽默》《英国

人的幽默》以及《笑的艺术》等著作。这些著作出版后，方先生说，怎么我在书店里一本都没看到过？或许，人们只是喜欢听点逗乐的，而从来没有想过“笑”是怎么产生的。对这样一个艺术创造中不能回避的问题，艺术教育中实在不可缺少。在哀悼方成先生时，希望他的这份关于笑与幽默的理论研究，也能得以研究、继承。“笑”不仅是逗乐，还是揭露、批判，是促进社会改良、人性向善的力量。

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。在我认识的老一辈漫画艺术家中，如华君武，如丁聪，如方成，都曾是吸烟者。这不难理解。因为在他们年轻的时代，正是卷烟大量输入之时。

吸烟成为一种时髦，连点烟使用打火机也是时髦。记得父亲讲过一个笑话：一位先生掏出烟卷递人一支，划着火柴为他点烟，但那位赶紧掏出打火机，道：“我有打火机。”打了几下没有打着，人家又划了一根火柴递过去，但他依然拒绝：“我有打火机”，结果又没有打着。如此几经往复，才点着了烟卷。在一种时尚流行时，许多人都不免为之裹挟，但等到吸烟危害被充分揭露时，再吸食卷烟就无异自戕了。我认识的几位老漫画家，华君武先生戒烟了，丁聪先生戒烟了，方成先生起先虽未戒烟，但看得出在尽力控制。我注意到每次聚会时，方先生总是克制着不吸。实在不行，就掏出一个小小的烟盒，大概只能装四五支烟，还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我在尽量控制。这个小盒是我一天的量，绝不超过。他们还都是控烟理念的积极传播者，都有大量的漫画传播控烟的理念。

赠人玫瑰，手染余香。听到方成先生仙逝，不仅漫画界、新闻界、艺术界同声哀悼，从事健康理念传播的朋友也都伤感地说：“又一位可爱的老头走了。”

未及成书的《五讲三嘘集》

■顾农

鲁迅先生曾打算写一本《五讲三嘘集》。“五讲”指他 1932 年 11 月在北平省亲期间发表的五次讲演，“三嘘”则是对三个文人一嘘了之的文章。但后来此书并未写出，当然也未出版。

1933 年底，鲁迅在回答杨邨人的公开信中写道：

至于所谓《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》，其实是至今没有写，听说北平有一本《五讲》出版，那可并不是我做的，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。不过既然闹了风潮，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。如果写起来，我想名为《五讲三嘘集》，但后半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。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，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，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，浅陋得很，连做一“嘘”材料也不够，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。

鲁迅这篇《答杨邨人公开信的公开信》当时也未发表，直接收进了《南腔北调集》。该集于 1934 年 3 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出版——从此，《五讲三嘘集》广为人知，虽然终于没有成书，而他当年意气之盛，

却可由此见其一斑。

鲁迅的诸多对手中，梁先生是最受重视者之一。鲁迅批评梁实秋的文章先前有好几篇，最著名的当然是《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和《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》，此外还有早一点的《卢梭和胃口》《头》和晚一点的《我们要批评家》等。对梁先生此后的缠斗，鲁迅并未怎么回答，仅考虑过以一嘘了之。

杨邨人曾加入共产党，原是太阳社成员，曾从极“左”观点出发反复批评茅盾，又无端造谣写无聊小文攻击鲁迅；后来退党，公开发表《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》《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》。鲁迅极端藐视其人，曾偶尔顺便刺他一枪，但未专门写过文章。可“革命小贩”杨邨人太无聊，竟忘乎所以地在刊物上发表致鲁迅的公开信，希望引起鲁迅的注意。这样的人物，正如鲁迅所说，只要以一嘘了之，不值得反驳。回他一封公开信，狠“嘘”了一通，算是抬举他了。

对于更“差一点”的张若谷，鲁迅也只是偶尔点到过，例如张参与撰写的《艺术三家言》（《二心集·沉滓的泛起》）。此外，

在《看萧和“看萧的人们”记》《文人无文》《不负责任的坦克车》《辨“文人无行”》等文中也小小地“嘘”过他几次。

仅以一“嘘”了之，表明鲁迅对某些对手的藐视，但尚非彻底的藐视。后来鲁迅说过：“形诸笔墨，却还不过是小毒。最高的轻蔑是无言，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。”（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半夏小集》）

鲁迅的“北平五讲”大致如下：

一、《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》，1932 年 11 月 22 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。柯桑记录稿载《电影与文艺》创刊号（1932 年 12 月），原拟编入《集外集》，被审查官删去；后收入《集外集拾遗》。

二、《今春的两种感想》，1932 年 11 月 22 日在辅仁大学讲。吴昌曾、邢新铺记录稿载北平《世界日报》1932 年 11 月 31 日《教育》栏。原拟编入《集外集》，被审查官删去，后收入《集外集拾遗》。

三、《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》，1932 年 11 月 24 日在女子文理学院讲。北平《世界日报》1932 年 11 月 25 日有报道。讲演记录稿鲁迅不予认可，后收入傅国涌编《鲁

迅的声音：鲁迅讲演全集》（珠海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版）。

四、《再论“第三种人”》，1932 年 11 月 27 日在北师大讲。可参见王志之《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前后》（《理论学习》1977 年第十期）。

五、《文艺与武力》，1932 年 11 月 28 日在中国大学讲。《北平晚报》当天曾有所报道，后亦收入傅国涌编《鲁迅的声音：鲁迅讲演全集》。

这样看来，“北平五讲”中现在可确知的是两讲，即《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》与《今春的两种感想》。

后来鲁迅在《集外集》的《序言》中写道：

只有几篇讲演，是现在故意删去的。我曾经能讲书，却不善于讲演，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。而记录的人，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，听不很懂，于是漏落，错误；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，取舍因而不确定，我以为要紧的，他并不记录，遇到空话，却详细地记了一大通；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，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。凡这些，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，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。

总之，著名的“北平五讲”，鲁迅本人只同意将其中两讲编入《集外集》。

至于拟议中的《五讲三嘘集》，他终于没有动手。